

试论生态美学理论内涵的中西之别

唐梅花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全球共同面临的生态问题催生了一系列以生态命名的学科,生态美学就是其中之一。虽然该领域至今依然存在着很多无法统一的理论问题,但其在美学界的迅猛发展却足见这个学科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在此过程中,中国生态美学紧紧抓住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机遇,提出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主张,展示出与西方生态美学不同的发展路径。在学科地位的建立、研究思路的拓展和审美模式的改变上都有着不同凡响的建树,从美学角度对全球生态运动做出积极的回应。

[关键词] 生态美学;理论内涵;中西之别

[中图分类号] B 83 - 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2) 05-0087-06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全球共同面临的生态问题,比如:气候变化、核辐射威胁、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生物技术等开始日益凸显。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生态成了核心话题,也因此催生了一系列以生态命名的学科,如生态批评、生态哲学、生态政治、生态伦理学、生态美学等。尽管生态美学至今依然存在着很多无法统一的理论问题,如学科命名的统一、概念内涵的确立、研究范畴的廓清等等,但其迅猛发展却是有目共睹的,足见这个学科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美学界努力贴紧时代的脉搏,提出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主张,展示出与西方生态美学不同的发展路径。西方生态美学虽然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后来的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文学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但其声势却远远不如西方环境美学。而中国生态美学的发展势头非常强劲,在学科地位的建立、研究思路的拓展、审美观念的改变上都有着不同凡响的建树。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我国生态美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了稳固的支撑和坚定的指引。

一、学科地位不同

西方生态美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949年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沙乡年鉴》(*A Sand Country Almanac*)的出版。在该书中,利奥波德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环保美学”,虽然在术语的表达上有所不同,但却包含着现代生态美学的主要价值观点,被视作西方生态美学产生的标志^{[1][2]}。美国生态美学家保罗·戈比斯特(Paul H. Gobster)就曾明确指出:“有关生态美学的想法大多源于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甚至达到了顶峰。”^[2]1972年,加拿大学者约瑟夫·密克尔(Joseph Meeker)将他发表在《加拿大小说杂志》的论文《走向生态美学》收入专著《幸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中,将标题改为“生态美学”,成为该书的第六章^{[3][119-136]}。这是目前可以找到的最早以生态美学作为标题的论著,密克尔也因此获得了“生态美学之父”^[4]的美誉。西方生态美学的真正发展是在20世纪90年代,戈比斯特连续发表了多篇论文,其中包括:《〈森林与景观:生态可持续性美学的联结〉导言》《生态管理实践中的森林美学、生物多样性和感知适应性》等,标

[收稿日期] 2021-04-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XWW008)

[作者简介] 唐梅花(1981—),女,福建福清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生态美学及生态批评研究。

志着西方生态美学的成熟。进入21世纪以后,生态美学在欧美学界呈现出多元发展的局面。戈比斯特依然着眼于风景美学;德国著名景观设计师乌多·威拉克(Udo Weilacher)和加拿大生态美学家斯蒂芬·夏庞德(Steven Sheppard)探讨生态美学在景观营造中的作用;土耳其生态美学家杰拉·艾慈恩(Jale Erzen)力图挖掘艺术对自然的关注,探讨当代生态艺术与美学和生态之间的关系等。由于对实用性功能的过分关注,西方生态美学在理论内涵的建树上稍嫌欠缺,以至于在西方美学界遭到了很大的质疑。加拿大著名环境美学学者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就曾公开指出:相较于被公认为“范围广泛、内容庞杂”的哲学研究领域的环境美学,生态美学则“有着与生俱来的不严密性”,更是提出将生态美学视为环境美学的组成部分^[5]。这不仅说明西方生态美学在学术地位上无法与环境美学相抗衡,甚至连独立存在的合理性都遭到了质疑。

相较之,中国生态美学的发展展示出完全不同的态势。与当代许多文学理论所经历的进程类似,中国生态美学也经历了从西方学界引介的阶段。1992年,《国外社会科学》连载了2期俄国学者曼科夫斯卡娅翻译的《国外生态美学》^[6],这是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被引介到中国的国外生态美学研究资料,但“该文实际上介绍的是西方环境美学”^{[7]195}。而“生态美学”这个学术术语我国已经有学者早此一年提出。1991年,台湾学者杨英风发表了《从中国生态美学瞻望中国建筑的未来》一文,提出中国建筑的未来发展之路应该是遵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美学之路,而非一味地追寻、跟随西方的脚步^[8]。虽然这篇论文并未对我国生态美学的理论内涵和研究范式进行深入探讨,但却首次提出了生态美学的概念^[9]。这个事件对于中国生态美学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说明中国生态美学并非是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产生,相反地,“中国学者一直坚信生态美学是自己的‘首创’”^[10]，“正好填补了生态研究的一个空白”^{[11]序言2-3}。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中国生态美学业已形成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比如:曾繁仁提出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程相占提出的“生生

美学”等都颇具代表性。连坚持采用“环境美学”这一术语来建构人与自然之间的审美关系的卡尔松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学界对于生态美学的坚持更为执着^[12]。卡尔松将3位中国学者的生态美学论文收录到他撰写的《斯坦福哲学全书》“环境美学”词条下,从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生态美学在国际上的影响。中国生态美学已经呈现出与“艺术哲学美学与日常生活美学三足鼎立发展之势”^[13]。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西方生态美学的学科地位不及中国生态美学,但也并非无可取之处。就像上文所提及的,西方生态美学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它对景观美学、宜居环境的关注,涉及现实生活中的很多关于环境建设的专业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这是值得我国生态美学界学习和借鉴的。

基于不同的发展趋势,中西生态美学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也呈现出分野之势。西方生态美学将生态美学在景观设计、资源管理中的实际功用作为关注的核心,而中国生态美学则结合中国国情努力探索自身的研究领域,建立生态整体主义的哲学立场,倡导人类的生态生存。

二、研究对象不同

西方生态美学的产生源于对自然界存在的美的保护和欣赏,是对美学过于关注艺术作品的反拨。曼科夫斯卡娅在《国外生态美学》中认为当时国外的生态美学“已远远超出了就艺术中的自然问题进行传统研究的范围”^[6],指出文艺研究的环境转向:不再把自然看作是艺术创作的背景,而应该看到自然本身具有的重要审美价值。随着对自然的关注和对实用性的强调,对自然景观的关注成了许多西方生态美学学者的研究核心。前文提到的戈比斯特首先是一位景观设计师,所以他的生态美学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对自然风景的审美,“旨在探讨景观研究中审美价值与生态价值相结合的问题”,促进“审美价值和生态价值更好的结合”^[14]。视觉上觉得美的景观未必对生态有益,而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景观可能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美,所以要从生态美学的视角来看待自然景观。正如利奥波德所指出的,判

断对错的标准应该在于是否符合生态要求，“如果试图保持完整、稳固和生态整体的美，那么就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的”^{[15]226}。夏庞德基于对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风景资源管理的状况的分析，提出以生态审美和生态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的可视化管理理论，着眼于森林美学的形成和探讨^[16]。新世纪以来，风景美学和森林美学等实践领域构成了西方生态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这与着眼于哲学思辨的中国生态美学有着很大的不同。

中国生态美学的研究范畴则经历了与环境美学交叉、被包含到最终确立的过程。首次使用“生态美学”这一术语的台湾学者杨英风在其论文《从中国生态美学瞻望中国建筑的未来》中主张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来思考中国未来建筑的发展，并未对生态美学的研究视域进行探讨。1994年，李欣复发表《论生态美学》一文，该文认为“以研究地球生态环境美为主要任务与对象”的生态美学“是环境美学的核心组成部分”^[17]，没有从根源意义上认识到生态美学的独特性。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生态美学专著是徐恒醇的《生态美学》，作者站在生态审美创造的角度，对生态审美观的形成以及生态美的意义和作用进行探究，并对“生态美”与“自然美”之间的不同进行辨析，指出自然美关注的是自然自身的审美价值，而“生态美却是人与自然生态关系和谐的产物”^{[18]119}，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徐恒醇对生态美学的核心范畴做出清晰的界定，人类不再外在于自然，而是内在于自然、成为自然的一份子，同时与自然和谐共处。至此，中国生态美学才渐渐厘清与环境美学之间或包含、或交叉的关系，显示出独特的研究范畴，即自然自身存在的美以及人与自然互动、和谐的美。曾繁仁认为应该将生态美学提高到生态存在论的高度，指出生态美学“是一种人与自然、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的处于生态审美状态的存在观”^[19]。生态存在论美学的提出对我国生态美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强调了在生态整体主义观念指引下看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三重和谐、生态的审美关系。

研究对象的不同必然导致审美范式的差异。

西方生态美学关注自然景观和森林美学等问题，因此多采用田野调查和科学实证的方法来获得审美体验，而我国的生态美学重在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审美理念，故而大多采用哲学分析的方法，提倡参与式的审美体验。

三、审美模式不同

传统美学强调的是通过感受来达到审美，但生态美学的审美对象已经不再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而是与人类共同组成生态系统的自然，那么相应的审美模式也必然发生改变。中国生态美学学者甚至认为生态美学最大的成就并不在于审美对象的改变，而在于审美方式的改变^[4]。那么，如何才能做到生态地审美？

西方生态美学因为着眼于现实指导价值，所以强调科学认知式的审美。正如对艺术进行恰如其分地审美需要掌握相关的艺术史和艺术批评方法，要对自然进行审美，也应当基于对自然史、科学知识的掌握和了解，只有那样，才能对自然进行如其所是的欣赏。因此，西方生态美学研究者很多都“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来“探讨人们对生态的审美体验”^[20]。比如，波兰生态美学学者玛尔塔·泽奥莱克（Marta Ziolk）等就以问卷的形式收集、整理人们对波兰国家公园景观的感受，以此证实景观美学与生态美学的一致性。这种实证调查、科学分析的方法常见于西方生态美学学者的论述中，正如卡尔松所强调的，在自然审美中，具备地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等科学知识是非常重要的^[21]。想要更好地进行生态审美，掌握适当的生态学知识和定量分析方法是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同时，由于生态学新范式强调自然系统的非平衡状态和动态变化，所以更应秉承科学的态度进行审美。出于这个原因，作为环境美学家的卡尔松对“生态美学”的抵触情绪有所消减——“‘生态美学’这个术语可以接受，但我并不认为它应当具有与‘环境美学’这一概念完全相同的意义”^{[22]331}。

在如何进行生态审美这个问题上，中国生态美学学者在辩证地吸收借鉴西方美学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创见。曾繁仁认为科学认知论“具有明显的人类中心论哲学立场”^[23]，于

是在吸收海德格尔关于“天地人神”四方游戏说的基础上形成的生态存在论美学,强调此在与世界的关系,认为只有融入其中才是存在的显现^{[24]157}。程相占充分肯定西方生态美学学者对生态学知识的强调对生态美学如何联结生态学和美学提供了重要参考作用——“生态学提供的生态知识对于审美体验有着巨大影响,甚至能够根本改变审美对象与审美体验”^[25],但同时也指出科学认知的局限——并未对生态和审美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阐释。生态审美的产生不是简单地由生态知识决定,还应该具备形而上层面的认知,而中国古代的自然审美中恰恰蕴含着这样的生态智慧,比如:古人在面对自然山水时“并非要认识其地理构造或矿产含量,而是为了‘游目畅神’”^{[26]169}。所以,生态审美应该以“人与世界融合为一的‘审美交融’模式”^{[27]73-74}代替传统的主客二分审美模式。因此,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智慧的基础上,程相占提出生态美学“是以中国传统生生思想作为哲学本体论、价值定向和文明理念,以‘天地大美’作为最高审美理想的美学观念”^[28]。生生美学的提出是中国生态美学学者在当今学界发出的中国声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阐释。

自从黑格尔将“美学”等同于“艺术哲学”以来,西方美学所关注的中心一直是艺术。生态美学存在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扩大美学的审美范畴,也不仅仅在于审美模式的改变。事实上,从人类的审美史角度来看,人类的审美对象远远不只艺术品。伴随着工业化的浪潮,回归自然、欣赏自然一直是西方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从英国的湖畔派诗人到美国的爱默生、梭罗,他们都以自己独特的自然审美方式来批判西方的现代性。生态美学所要进行的革命深入到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我们所构建的生态美学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扩大审美对象的范围上,而应该深入到生命的存在方式和人类的思维方式层面,从生态的生存方式与生态的思维方式来立论”^[4]。

四、发展背景不同

基于严峻的生态危机的催生和美学学科内部

变革的双重历史背景产生的中西生态美学,肩负着同样的历史使命,但却在中西方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这不仅由于中西生态美学对发展道路的不同选择,还源于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

从词源学的意义上看,英语中并没有一个可以与中文“生态”完全相对应的词,只有一门被称为“生态学”(ecology)的科学。这个术语首次出现在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的《普通生物形态学》(1866)一书。海克尔指出,生态学是一种旨在描述有机体与其所存在环境之关系的整体科学^[23]。但“生态美学”却并非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生态”一词,尽管在生态审美中我们有时候也需要借助于生态学知识。正如我们看到的,目前很多冠以“生态”的学科都只是用了生态学的构词成分“eco-”,生态美学也好,生态批评、生态伦理学等等也罢,所以生态美学中的“生态”一词主要是吸收、借用了ecology所蕴含的“人与自然的亲和性关系”^[22]之意。因此,换句话说,生态美学并非生态学和美学的简单相加,而是借用生态学的知识和视野来探讨人对自然、人与自然之间的审美关系。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揭示是生态美学的一个重要特性。美国环境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也意识到中国学者对生态美学的偏爱并非偶然,因为中文中的“生态”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别的生物学理论,而是指一种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的原则^{[29]140}。

从经济发展上看,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西方生态美学,虽然其中包含着后来生态美学的基本思想,但其出发点是为了保护环境,以便更好地让自然服务于人类。西方生态美学产生的时候,西方大部分国家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进入了后现代工业社会,自然是作为人类的服务对象而存在的。就像利奥波德所言,“我们寻求与自然的联系,是因为我们从自然中得到欢悦”^{[30]194}。西方生态美学的后续发展也可作为印证。不管是致力于景观美学的戈比斯特,还是关注风景管理的夏庞德,他们对生态的审美和关注最后的落脚点其实都是人类。随着学界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反思和批判,西方生态美学学者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思想着力点。威拉克在《当今景观营造中的生态美学?》一文的开

篇引用克劳斯·斯皮策的话:“在花园里,大自然理应是主人”,而拥有它的人类只不过是一个初学者,“他必须遵守游戏规则”,倡导在景观设计中顺应自然规律的生态审美^[31]。但即便完成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转向,在资源相对丰富的发达国家,西方生态美学依然无法摆脱主客二元论的影响。而且,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西方生态美学的倡导者大多不是专业的美学学者,只是从各自的职业领域跨界到生态美学,所以无心也无力从事理论内涵的探讨。

中国生态美学是在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才形成一定的规模。在工业化逐步深化的过程中,人们开始认识到人类行为对自然造成的改变,令人窒息的雾霾、淡水资源的缺乏、增多的极端天气以及各种怪病的丛生等让人类开始反思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可能导致和已然导致的环境后果。因此,不同于在经济发展后的反思和保护中产生的西方生态美学,中国生态美学是在急需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与自然资源空前紧缺的国情的矛盾中产生和发展的。值得庆幸的是,我国拥有丰富的传统生态文化资源,自2007年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为基本国策以来,中国生态美学的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来临,意味着包括生态美学在内的生态文明理论成为反映时代精神的主流话语”^[13],因此得到了更多的支持与发展空间。党的十八大提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努力建设美丽中国”^{[32]30-31}。“美丽中国”的提出意味着保护自然不再是一句形而上的空洞口号,而是关系着每个人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五位一体的建设目标中,提出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33]50},树立了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我国当代生态美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并指明了方向。中国生态美学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作为指导思想,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论支点,紧密地贴合时代精神,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总之,相较于西方生态美学,中国生态美学

有着更丰厚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不仅是对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的再阐释,而且符合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追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生态美学更应该积极转型、立足现实,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抓手,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为依托,以西方环境美学和西方生态美学的发展为参照,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话语体系,扩大在国际生态美学领域的影响,积极为应对全球生态危机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程相占. 美国生态美学的思想基础与理论进展 [M] // 曾繁仁, 谭好哲. 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 [2] MARK W BRUNSON, LINDA E KRUGER, CATHERINE B TYLER, et al, eds. Defining social acceptability in ecosystem management: A workshop proceedings [M]. Portland, OR: U. 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Pacific Northwest Research Station, 1996: 77.
- [3] JOSEPH MEEKER. The comedy of survival: 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 [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2.
- [4] 程相占. 论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联系与区别 [J]. 学术研究, 2013 (1): 122-131.
- [5] 艾伦·卡尔森, 著, 赵卿, 译. 生态美学在环境美学中的位置 [J]. 求是学刊, 2015 (1): 115-119.
- [6] H B 曼科夫斯卡娅, 著, 由之, 译. 国外生态美学: 上 [J]. 国外社会科学, 1992 (11): 33-37.
- [7] 曾繁仁. 中西对话中的生态美学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8] 杨英风. 从中国生态美学瞻望中国建筑的未来 [J]. 建筑学报, 1991 (1): 42-45.
- [9] 胡友峰. 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J]. 中州学刊, 2018 (11): 150-161.
- [10] 程相占. 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 [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6 (3): 35-40.
- [11] 曾繁仁. 转型期的中国美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12] ALLEN CARLSO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ethics and ecoaesthetics [J].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2018, 76: 399-410.

- [13] 曾繁仁. 我国自然生态美学的发展及其重要意义: 兼答李泽厚有关生态美学是“无人美学”的批评 [J]. 文学评论, 2020 (3): 26-33.
- [14] 保罗·戈比斯特, 著, 梳逝, 译. 西方生态美学的进展: 从景观感知与评估的视角看 [J]. 学术研究, 2010 (4): 2-14.
- [15] ALDO LEOPOLD. A sand countr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 [16] S R J SHEPPARD, H W HARSHAW, eds. Forests and landscapes: Linking ecology, sustainability and aesthetics [M]. New York: CABI Publishing, 2001: 149-172.
- [17] 李欣复. 论生态美学 [J]. 南京社会科学, 1994 (12): 53-58.
- [18] 徐恒醇. 生态美学 [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 [19] 曾繁仁. 试论生态美学 [J]. 文艺研究, 2002 (5): 11-16.
- [20] 李庆本. 国外生态美学状况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 (5): 115-118.
- [21] SEE ALLEN CARLSON. Appreciation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J].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1979 (37): 267-276.
- [22] 艾伦·卡尔松. 从自然到人文: 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文选 [M]. 薛富兴,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 [23] 曾繁仁. 关于“生态”与“环境”之辩: 对于生态美学建设的一种回顾 [J]. 求是学刊, 2015 (1): 107-111.
- [24] 曾繁仁. 生态美学导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25] 程相占. 生态美学: 生态学与美学的合法联结: 兼答伯林特先生 [J]. 探索与争鸣, 2016 (12): 52-57.
- [26] 程相占. 生态美学论集: 从文艺美学到生态美学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27] 程相占, 阿诺德·伯林特, 保罗·戈比斯特, 等. 生态美学与生态评估及规划 [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3.
- [28] 程相占. 生态美学的十年进程 [J]. 鄱阳湖学刊, 2012 (6): 73-80.
- [29] ARNOLD BERLEANT. Aesthetics beyond the arts: New and recent essays [M].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 [30] 奥尔多·利奥波德. 沙乡年鉴 [M]. 侯文蕙,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9.
- [31] HEILE STELOW, VERA DAVID, eds. Ecological aesthetics: Art in environmental design: Theory and practice [M]. Basel: Birkhauser, 2004: 116-119.
-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 [33]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Ecological Aesthetics

TANG Mei-hua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mid-20th century,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has spawned a series of disciplines named after eco-, one of which is Ecological Aesthetics. Although there are still many theoretical problems that can not be unified in this field, its rapid development shows the vitality and prospects of this discipline. In this process, Chinese ecological aesthetics has seized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put forward idea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uccessively, showing a different development path from Western ecological aesthetics. It has made extraordinary achievement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disciplinary status, the expansion of research ideas, and the change of aesthetic mode, and has made a positive response to the global ecological movement.

Key words: ecological aesthetics;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academic field

(责任编辑 陈蒙腰)